

跨文化視閥下的
濟慈詩論和他的詩

周桂君 著

A STUDY OF JOHN KEATS' POETICS
AND HIS POEMS FROM
A CROSS-CULTURE PERSPECTIVE

JOHN
KEATS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跨文化視閥下的
濟慈詩論和他的詩

周桂君 著

A STUDY OF JOHN KEATS' POETICS
AND HIS POEMS FROM
A CROSS-CULTURE PERSPECTIVE

JOHN
KEATS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视阈下的济慈诗论和他的诗 / 周桂君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5760-5

I. ①跨… II. ①周… III. ①济慈 (Keats, John
1795-1821) — 诗歌研究 IV. ① 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5020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跨文化视阈下的济慈诗论和他的诗
周桂君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艺堂印刷(天津)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760-5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10×960 1/16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 47.00 元

序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生命历程，像一首悲凉短歌，感天地、泣鬼神。对中国人来说，英国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中，比之于拜伦和雪莱，济慈的名字是响亮的，同时，又是陌生的。尽管近年来对济慈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对于这位伟大的作家来说，尚有数不清的领域等待我们的研究者涉足。这本书就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青年学者积累多年、苦心经营的硕果。周桂君教授以他那支如花妙笔，一反学术著作枯燥乏味之弊，笔走龙蛇，吐纳珠玑，时而若雷过天际，隆隆震响，时而如风过柳林，轻声细语。

本书独辟蹊径，选取了跨文化视角对济慈的诗歌作品和诗学理念进行探索，并研究了济慈审美倾向上与希腊文化的亲缘关系。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将济慈诗歌放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展现了济慈思想的复杂性，揭示了济慈诗中深奥与微妙的哲思。东方文化背景的引入，为重新解读济慈诗歌的思想与艺术内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开拓了济慈研究的思路，对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更新富有启示作用。

论著从文本出发，决不空谈理论，而是通过掷地有声的文本分析来寻求结论。本书对济慈诗中的代表性作品都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涉及济慈诗歌中所有主要类别的诗作：长诗、十四行诗、颂诗，等等。这些研究一方面推陈出新，一方面拓展研究范围，扩大研究视域，力求全面系统。例如，本书对以前国内研究中很少关注，但在济慈的创作生涯中具有转折性意义

的长诗《伊莎培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由此，我们看到了济慈诗歌走向成熟的过程。

论著对济慈诗学理念的论述也颇有新意。济慈一生没有写过专门的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与他同时代的柯勒律治和雪莱都写过长篇的文学批评专著或者论文，济慈论诗则只有片言只语，散见于他的书信中。然而，正是这看似数量极小、不经意而为的著述，却蕴含着极大的思想能量，它不是含金的矿石，而就是金子。著作对济慈文学批评的风格、批评思想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都做了阐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认为济慈诗学的基本特征是注视性、认同性，济慈诗学重体悟，而非逻辑推理。

我很高兴为这部著作写一个序。因为，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的惊奇。我惊叹作者勇于创新的学术胆识。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莫言在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时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结识本书的作者多年了，他就像莫言这句话里描述的那种从事写作的人一样，他很谦和，也很虚心，对此，我深有体会。而他在做学问时，真是让我惊叹他的“颐指气使，独断专行”了。

祝愿本书的作者在学术道路上再创佳绩，早日登上学术的珠峰。

北京大学 刘意青

前言

英国诗坛上有这样一位诗人，他在贫困的生活中苦苦挣扎，却不肯舍弃成为一个诗人的梦想，在死亡的阴影中几经徘徊，却热烈地憧憬生命的未来。短暂的生命如流星，却将美的诗篇凝固为永恒。他与自然为伴，与艺术为伴，在与自然和艺术的对话中，感受生命的欢畅，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琼浆浇灌了那颗美丽的诗心。他就是 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 — 1821）。

济慈出身贫寒，少年时就成了孤儿。1810 年，为了生计，济慈跟随一位外科医生做了学徒。这对于富于幻想、酷爱文学的少年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1816 年，济慈决定弃医从文。1817 年，济慈第一部诗集出版。《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蟋蟀与蚱蜢》、《睡眠与诗》是济慈早期的优秀诗篇。1818 年，长诗《恩狄芒》出版，诗人对美的事物的感受力和强有力的诗化语言以及杰出的诗歌才能在这部长诗中得以展现，继而一发不可收。《伊莎培拉》、《圣亚尼节前夕》、《无情的妖女》、《普塞克颂》、《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忧郁颂》、《拉米亚》等诗作相继问世。1821 年 2 月，济慈因肺结核病在罗马去世。他为自己拟定的墓志铭是：“这儿躺着一个名字用水写成的人。”

济慈只活了 26 个春秋，他的创作时间也不过三四年，就在这三四年的时间里，济慈的诗歌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济慈的生命历程，与其说是由一系列的事件组成，毋宁说是由一系列的情感和思想连缀而成：诗

人不断地叩问自己的诗人之梦；在亲情、友情的慰藉中，战胜生活的艰辛；怀着无望的爱情走完自己短暂的人生。济慈的一生是为自然的一生，为艺术的一生，他在对自然美景的陶醉中找到了生命的欢乐，在对艺术的追求中找到了美和生命的价值。济慈通过对自然的书写抒发内心的情感。自然经过诗人的书写变成了艺术化的自然，这个自然满足了诗人的精神需要。诗人在创造这个艺术化自然的过程中，找到了心灵的寄托。自然安顿了济慈的心灵，也让诗人理解了生与死。诗人在对自然的书写中使主体的自己与客体的自然之间产生了一种关系。诗人往往从自然景物中获得某种感受，这样一种感知自然的过程反映在诗中，就是自然景物描写在前，诗人出场在后，诗人是逐渐浮出水面的，即诗人主体的飘浮。济慈书写自然的过程就是美的创作过程。它使诗人从痛苦的现世生活中得到解脱，获得了生命的自由。

在济慈一生的诗歌艺术生涯中，他写得最为成功的诗作是他的颂诗，但是济慈对长诗情有独钟，他认为写长诗就如同长久地在林中漫步，那会让人享受更大的心灵欢乐。济慈的长诗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伊莎培拉》是一部过渡性作品，诗中的意象优美精致，想象绮丽，但就其结构上讲，像济慈的首部长诗《恩狄芒》一样，仍然有些不足。济慈的颂诗是英语诗歌宝库中的珍品，他的《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一直是批评话语的焦点，然而，这些伟大的诗歌作品仍然有宽广的研究空间，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索。济慈的十四行诗也是济慈诗歌艺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济慈是一个重感性、轻理性的诗人，他对理论论证和逻辑推理毫无兴趣，没有做过专门的诗歌研究或诗歌批评，但是济慈却将他的创作感悟写进了他的书信里，虽然着墨不多，但其中却蕴含着真知灼见。“消极能力”和“诗人无自我”都成了诗歌批评领域最有创见的观点。济慈的诗学特征主要是认同性和注视性。以济慈对诗歌理论的探索方式观之，济慈的诗学是在认同中寻觅真理。从隐喻的角度来说，济慈的诗学可视为“注视”的诗学。济慈诗学关注的焦点在于自然美和艺术美。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深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中，要想深入地理解浪漫主义诗歌的精神内涵，我们就必须追本溯源，站在西方文化的地平线上展望济慈的诗歌。济慈是一位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诗人，研究济慈的思想和审美不能不首先理解古希腊的神话。古希腊神话内容丰富，其核心内涵是人文主义思想，它体现了古希腊人对人的赞美，对尘世生活的强烈热爱。古希腊神话的审美情趣是壮美的，也是和谐的。济慈的诗歌不仅体现了古希腊神话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且在审美情趣上也深受古希腊神话的影响。

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维克托尔·马克西莫维奇·日尔蒙斯基（Zhirmonsky）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决定了文学历史进程的统一性。日尔蒙斯基把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与文学研究的任务联系起来，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提供了新思路。社会发展存在共同的规律性和一致性，这成为对没有相互影响的文学现象及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理依据，也即比较文学中常说的平行研究，即把有相似性，但没有直接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作家或者作品加以比较研究。济慈审美观与中国古代道家的审美观有相近之处，而济慈诗学理论的核心概念“消极能力”说与庄子的“虚静”理论也有可比性，道家之“忘”的哲学思想与济慈的“忘”亦有相通之处。济慈诗歌的审美特性也可以通过中国古典美学得以阐释。本书将济慈的诗歌置于跨文化视角下进行观照，从一个更加宽广的角度来研究济慈的诗歌。

周桂君

2017年6月于东北师范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诗思的流星——诗人与他的诗人之梦

第一节 贫寒才子的诗人之梦	3
第二节 结识文人墨客并渴求手足知音	5
第三节 生死边缘的爱情之焰	9
第四节 品味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盛宴	13

第二章 激情的迸发：自然书写中的情感释放

第一节 安顿动荡心灵的伊甸	21
第二节 自然体悟中的主体飘浮	40
第三节 寻美之路即自由之路	44

第三章 诗苑的奇葩：济慈诗歌的解读

第一节 济慈诗歌中的哥特文学传统	58
第二节 不同语境下的济慈颂诗	76
第三节 译介角度的济慈诗歌分析	87
第四节 济慈的美学理念	93
第五节 济慈诗中对死亡主题的诠释	101
第六节 济慈诗中对生命内涵的思索	113

2 跨文化视阈下的济慈诗论和他的诗

第四章 感悟艺术真理的脉动：济慈的诗学品质

第一节 济慈的“注视”诗学	121
第二节 对生存本体问题的探索	130
第三节 文学批评中的认同问题	137
第四节 变色龙效应	143

第五章 插上灵异的翅膀：希腊神话与济慈的诗歌

第一节 古希腊神话的思想内涵	150
第二节 诗性的神话	165
第三节 古希腊神话与济慈的诗歌	169

第六章 异域的和声：济慈思想与道家思想之比较

第一节 济慈审美观与道家审美观	185
第二节 “虚静”理论与“消极能力”说	198
第三节 济慈之“忘”与道家之“忘”	214

第七章 他山之石：中国古典美学视阈下的济慈诗歌

第一节 绮丽的意象	228
第二节 洗练的语言	235
第三节 豪放的风格	243
第四节 婉约的情调	252

参考文献	257
------------	-----

后 记	265
-----------	-----

第一章 诗思的流星—— 诗人与他的诗人之梦

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家庭。1804 年，他的做马厩的雇工领班的父亲坠马身亡。两个月后，母亲再嫁，济慈和他的弟弟妹妹与外祖父和外祖母一起生活。1805 年，济慈的外祖父去世，家人为遗嘱打官司，外祖母带着孩子们住到了伦敦郊外的埃德蒙镇，这时候，济慈的母亲和他的继父分居，也来和孩子们一起生活。1810 年，济慈的母亲死于肺病。同年，由于生计所迫，济慈按照遗孤监护人的安排，跟随埃德蒙镇的外科医生哈蒙德做了学徒。1814 年，济慈的外祖母去世。1815 年，济慈进入伦敦盖尔斯医院作实习药剂师。早在上中学的时候，济慈就在好友查尔斯·克拉克的鼓励之下开始写作诗歌，他模仿伊丽莎白时代的诗人斯宾塞（Spenser）写了一些诗。1816 年 5 月在亨特所编的《观察家》杂志上发表十四行诗。1816 年 7 月，通过考试，成为药剂师协会的持证会员，10 月，济慈写下了他早期的名篇《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结识亨特、雪莱、赫兹利特、兰姆等人。11 月间，济慈决心弃医从文。1817 年，济慈出版第一部诗集，虽然其中多数诗作有模仿的痕迹，但也颇有些佳作，如《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蟋蟀与蚱蜢》、《睡眠与诗》等。1817 年 4 月，济慈开始写作长诗《恩狄芒》，这部作品在 1818 年初完成，同年 4 月，由奥利尔公司出版。长诗分为四部，以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爱上凡间少年恩狄芒的故事为题材。长诗的结构有些松散，但济慈在这部长诗中已经显露出对美的非凡感

2 跨文化视阈下的济慈诗论和他的诗

受力和驾驭诗化语言的杰出才能。3月，济慈写作他的另一部长诗《伊莎培拉》并照顾生病的三弟托姆。6月，济慈的二弟乔治结婚，与妻子移民美国。8月，济慈的长诗和此前出版的《诗集》受到当时英国有名的学术杂志《布拉克伍德》(Blackwood)和《评论季刊》(Edinburgh Review)的攻击。随后，济慈开始写作长诗《海壁朗》，此时，济慈初遇后来成为他恋人的芳妮·布劳恩。12月，弟弟托姆因肺病去世。1819年是济慈创作的高峰期。他完成了《圣亚尼节前夕》、《无情的妖女》、《普塞克颂》、《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忧郁颂》、《拉米亚》等诗作，还与布朗合作写了《奥托大帝》。后来，他放弃了《海壁朗》的写作，使这部作品成为残篇。1819年10月，济慈与芳妮·布劳恩正式订婚。1820年2月，济慈患病，首次肺出血，医生严禁他外出，6月济慈病情加重。7月，他的诗作《拉米亚》、《伊莎培拉》、《圣亚尼节前夕》及其他诗作出版，受到亨特和兰姆的好评。8月，雪莱邀请济慈去意大利过冬，济慈婉拒。9月，济慈在朋友的陪同下，乘船前往直利，11月到达罗马，1821年2月在罗马去世。墓碑上的铭文是济慈自己拟定的：“这儿躺着一个名字用水写成的人。”

当我们历数这位只活了26个春秋的天才诗人的生平事迹的时候，不禁心潮起伏。因为他从事诗歌创作只有三四年时间，在这短暂的几年中，济慈的诗歌艺术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他的岁月不是用年，而是用天、用小时来计数的。他带着天才诗人那“蓬勃的思潮”，带着那支绘出完美的秋天、富丽的古瓮和美妙的夜莺的“神笔”，带着对美丽的恋人芳妮的怀念，离开了这个带给他无限苦难的人间。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George Brandes)说：“对济慈一生中文学活动以外的方面稍加一瞥，我们便可以看到三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的事实——不存在真正能够获得谋生手段的任何希望(他曾经想移居南美，或者申请在来往于印度的商船上当一名外科医生)；对一位妇女怀着一种狂热而毫无希望的爱，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她，自己的生命便毫无价值；最后就是蚕食他的生命的肺病。”^① 济慈的生命历

①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徐式谷、江枫、张自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程，就像一首悲凉短歌：没有惊心动魄的事件，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但一切又如悲歌一样凄楚悲凉，感天地、泣鬼神。济慈的生平是由一系列的情感和思想连缀而成。这些情感和思想如同一串串珍珠，我们一粒粒地将其拾起，就可以得到有关济慈生活的一个概貌：诗人苦苦追求自己的贫寒才子的诗人之梦，不断结识文人墨客并渴求手足知音，燃烧处于生死边缘的爱情之焰，在美的乌托邦中品味自然美和艺术美的盛宴。

第一节 贫寒才子的诗人之梦

在早期的书信和作品中，济慈常常自问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诗人，这与济慈的生活经历有关。与济慈同时代的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和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家境都很富有，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唯有济慈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去学做外科医生。对于一个天性敏感，主要兴趣在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诗人来说，做这样的工作实在令人难以忍受。1816年，年仅21岁的济慈做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这个决定意味着他将背离一种通往稳定富有生活的道路，去做一件很可能是劳而无功、无所成就的事情。靠写作得来的稿费是一项不太可靠的收入，无法依靠它来解决经济上的问题，这对贫困的诗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济慈的监护人爱彼先生很不理解诗人的这一选择。在爱彼先生眼里，当一个诗人，百无一用，所以他对济慈冷嘲热讽。面对重压，济慈没有退却，但对一个没有经济保障，也没有健康身体的人来说，去做一个诗人，这是一条太过艰辛的不归路。济慈常常为诗歌冥思苦想，寝食难安，追求艺术的道路本来就险象环生，充满艰辛，而诗人的贫困和多病使他比别的艺术家更多了一重对前途未卜的未来的担忧。济慈在1815年5月10日致李·亨特的信中写道：“我一直在不断地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一定要当一个诗人，而不去做个普普通通的人——看到这是一桩多么了不起的事——看到在诗中有所创获是多么了不起——众口流芳是一桩怎样的事——可是到末了一阵凶猛的心血来潮冲决了我表面的自制力，以至于我那天几乎要同意我自己堕落为一个率

性而为的人——当然这是在付出了艰巨努力之后的不光彩退却，此刻我又把这个念头从心中驱逐了出去。”^① 济慈用书信为我们记载了他在追求诗人之梦时遭遇的种种苦难。诗人的情绪本来就很敏感，处在这样的生活压力之下，济慈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倍加关注，这也使得他的精神极度地紧张，质疑诗人之梦其实是济慈寻求放松的一种方式。

虽然济慈在书信中不断叩问自己是否能够成为一个诗人，但事实上，济慈对这一点片刻都没有动摇过。济慈对自己的诗才是很有信心的。即使在批评家们对他进行恶语中伤的时候，济慈也不退却，他坚信，自己一定会跻身伟大诗人的行列。面对当时有名的文学评论杂志《布拉克伍德》和《评论季刊》对他的诗作《恩狄芒》的诋毁，他写道：“我要独立自主地进行创作——我过去一直是不带主见地独立创作——今后我要带着自己的判断来创作——诗之灵才必须能够在一个人身上体现自救；它的成熟不能依靠法则和公式，而只能依靠内在的感受和目光炯炯的内省——凡有创造力者一定能创造它自己——”^② 济慈对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他对诗歌的敏锐的感受力上。他对于自己诗歌的优点以及不足也是很清楚的，正因如此，他明白批评家对他的指责中有多少合理的成分，又有多少不合理的成分。将其综合之后，济慈便可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诗才。对于济慈来说，诗是他的生命，诗给他痛苦，也给他喜悦。当他感到诗情的流水不是滔滔而来的时候，他困惑，他绝望，他不想再前行。但济慈的这种痛苦并非来源于对自己诗才的怀疑，其实，济慈对自己的质疑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的压力和自己的健康状况。

济慈病弱的身体常常让他感到疲劳，不能如愿地写下自己的才思。在1817年5月16日致泰勒和赫塞的信中，济慈写道：“我一天又一天地写诗已经有一个月了，在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某一天，我发现自己的大脑是如此疲劳，以至于其中既无韵律又无理解——于是我被迫停了几天笔——我

① [英] 约翰·济慈：《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② 同上书，第212页。

希望不久能恢复工作——我曾努力试过一两次，但是无济于事——我头脑里的晕眩代替了诗歌——并且感觉到了智力堕落的种种影响——精神的低迷——空有赶路的一腔急切而没有力气这样去做，对我的根本性进展发生不了任何作用——但无论如何，明天我一定要开始下一个月的的工作。”^①这段文字让人读了倍感心酸。诗人那滚滚的思潮不能尽情倾泻，因为他的身体囚禁了他的灵魂，那只有着冲天之翼的诗之鹏鸟不能展翅飞翔。心灵中那渴望的火焰燃烧着，但那火焰消耗的首先是诗人的生命，然后才是那生命中装载的神奇诗思。

第二节 结识文人墨客并渴求手足知音

除了对诗歌、对自然的爱以外，济慈的生活中还有另外一种情感，那就是他对兄弟姐妹的关爱和与朋友的情谊。虽然济慈自己说他并不喜欢社交，但他其实很善于结交朋友。在他的友人中，有诗人，也有画家。尽管济慈的兄弟姐妹并不像济慈那样具有艺术气质，但济慈却努力地与他们建立起一种相互理解、分享思想的关系。在1817年给妹妹范妮的信中，济慈写道：“假定你只是每周写6页纸——每隔一段给我寄来，那么你就可以非常频繁地得到我写满几页纸的来信——我觉得这是种必须：我们之间应该变得更加亲密无间才好，这不仅为的是我应疼爱你这个唯一的妹妹，更为的是随着你的长大，我还可以把你作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来吐露衷肠。”^②从信中，可以看出济慈对妹妹的关爱，并且希望他们在成年以后还可以成为心心相印的兄妹。虽然范妮并没有像济慈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能够分享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妹妹，但有一位女士凭借她的才智，荣幸地处于这种位置上，她就是济慈的弟妹——乔治的妻子。乔治和妻子于1817年移民美国。同年，济慈给远在海外的弟弟和弟妹写的长信中提道：“我亲爱的弟

① [英] 约翰·济慈：《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版，第22页。

② 同上书，第359页。

妹，我恐怕难以说出因为距离遥远可以用笔写下的话来：我对你有一种亲切之感，一种敬佩之感，我觉得我对世界上任何别的女子都没有这样深、这样纯真的感情。你会提到范妮——她的个性尚未形成，她在我心上没有你那样的分量，我打心底里盼望有朝一日我对她的感觉能像对你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但我们绝非是自己熟识起来的——我们打交道几乎全是通过你，我亲爱的弟弟——通过你，我不仅是认识了一个妹妹，而是认识了一位了不起的人中之英。”^① 济慈对这位弟妹评价很高，以后，每周都会给她写一封信。在国内生活困窘的诗人，和他远在异国的弟弟、弟妹之间的这种沟通对彼此来说都是情感上的一种慰藉。济慈鼓励他们说：“我亲爱的弟弟妹妹，你们必须像我一样，振作起来承受住任何灾难，为了我你们要这样做，就像我为你们这样做的一样。”^② 这样的文字令人感动，在艰难的生活面前，兄弟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他们把彼此的爱化做了生存的力量。

济慈在与他的诗人朋友和画家朋友的交往中，他们的话题主要是诗歌、自然风光和思想感悟。这是一种心灵的交往，这种交往让济慈可以在写诗的空隙中，稍作停留、稍加思考，而这种停留和思考在他的书信中留下痕迹，成为后世济慈研究的宝贵资料。当我们在济慈的书信中读到他关爱朋友的亲切话语时，我们很难想象这些话语是出于一个年轻的诗人的笔下，因为那其中透出的温情、细致和周到让人吃惊。济慈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写出了世界一流的诗歌作品，而纵观济慈的书信，更让我们吃惊的是，济慈的人生也像他的诗歌艺术一样早熟。济慈和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的交往也留下很多佳话。雪莱在济慈病重期间，曾邀请他去意大利养病。济慈对前辈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更为敬仰。早在 1816 年，济慈曾在书信中写道：

有几颗伟大的心灵在大地流连；
一位居于赫尔韦林山峰巅，

① [英] 约翰·济慈：《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7 页。

② 同上。

代表云霞、湍流与湖泊、清明无限，

天使之翅使他精神振奋。^①

这里居于赫尔韦林山峰巅的伟大心灵指的就是华兹华斯。济慈以他诗人的敏感把握住了华兹华斯诗歌的灵魂所在。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华兹华斯和济慈之间并没有建立起深厚的友情，这多半是由于华兹华斯高傲的个性阻止了这两位杰出诗人的相知。济慈曾把自己的诗读给华兹华斯听，本想得到这位前辈诗人的赞美，但华兹华斯只是十分平淡地认为这是一首很美的异教徒诗作。华兹华斯这样的态度对济慈这位崇拜者来说，无疑是浇了盆冷水。勃兰兑斯在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书中，引用了济慈气魄恢宏的长诗《海壁朗》的一个片断，这个片断写了全体被推翻的巨灵神聚集在一个地下墓穴里议事的情景。他们那年老力衰的首领灰心丧气地说，那些曾经的巨人们被压倒了、被赶走了、被打垮了，年轻的阿波罗在旭日初升的时刻降临人间。勃兰兑斯说：“在这一节思想既深刻文笔又优美的诗里，济慈成了不仅限于他自身的一整代诗星的代言人。这不仅是他那天赋诗才的证明，这也是一篇宣言书，宣告年轻一代的诗人已经登上了迄今一直由湖畔派诗人和司各特把持着的诗坛。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诸神的名义下，人类的智能时常遭到禁锢而长期停滞不前；这种情况出现得实在太多了。要想有所进步，就经常要求变更统治者。华兹华斯和司各特是威震诗坛的巨灵神，可是当年轻一代登上舞台的时候，他们的赫赫神威便黯然无光了。济慈本人正是那只羽毛金光灿烂的雄鹰，它振翅直上云霄，高高翱翔于华兹华斯那棵枝繁叶茂的老橡树的顶空。”^②或许是看到年轻诗人的巨大威力，华兹华斯感到自己的诗坛地位受到了威胁，才用如此冷淡的态度对待济慈。济慈后来在书信中写道：“凡是华兹华斯在城里访问过的地方，他的唯我独尊、虚荣心以及固执都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不过，即使他算不上哲

① [英] 约翰·济慈：《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页。

② [丹麦]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徐式谷、江枫、张自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2—143 页。